



从清人所编宋诗选本看清代宋诗学之辨体

谢海林

摘要: 诗歌选本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学批评形式。透过清人所编宋诗选本这一重要窗口,可以观照出清代宋诗学的历史进程。辨体是诗界、选坛的首要命题。在唐宋诗之争的大背景下,清人主要从性情之真伪、源流之正变来辨宋诗之体,追求“真”宋诗,最终趋向分体各师,折中融通。

关键词: 清代;宋诗选本;诗学;辨体

一、引言

明嘉隆以来,诗界弥漫着一片尊唐黜宋之音。尽管公安、竟陵诸有识文人奋力反拨,终究影响式微,旁门别派挡不住“格调”一统的大势。学唐末流之弊众人皆知,诗坛亟须革故鼎新。这不仅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趋势,也是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。源于唐而变于唐,身受数百年冷遇的宋诗,恰是医治尊唐末流的一剂良方。晚明以迄清初康熙年间,是唐宋诗之争最复杂激烈的时期。诗坛风气一时尊唐黜宋,忽而祖宋抑唐,末流所向,依葫芦画瓢,句剽字窃,未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。通过尊唐或宗宋来拯救各自末流之弊,久而久之,实际上彼此都陷入了同一窠臼。康熙十二、三年间(1673、1674),汪懋麟曰:“今之窃学言唐者,必以黜乎宋为言;而窃学言宋者,又未深究乎所以为宋之意,之二者,其失一而已。……按以古人之法,若者唐,若者宋,若者于唐、宋之貌似矣而非似,至不能名为唐之诗,宋之诗,则亦自名其为己之诗而已,又乌可不辨耶?”^①唐宋两派相互诋辱,其失实一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陈訐《宋十五家诗选序》曰:“昔敝于举世皆唐,而今敝于举世皆宋。举世皆唐,犹不失辞华声调、堂皇绚烂之观。至举世皆宋而空疏率易,不复知规矩绳墨与陶铸洗伐为何等事?嗟乎,此学宋诗者之过也。”^②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王嗣槐代人为顾贞观《积书岩宋诗删》作序云:“今选诗家,必坦唐而訾宋之性灵,又必有坦宋而訾唐之肤廓,此昔时拘以风格而弃之者。”^③尊唐祖宋之末流,只袭其貌而不得其真,貌合神离,故皆有流弊。这也是诗人、选家们辨体宋诗的一大诱因。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王鸣盛为汪景龙、姚垌《宋诗略》作序曰:“顾后之学诗者,率奉所谓唐音以抹煞后代,故有称宋诗者,则群讥之曰庸,曰腐,曰纤。……是书也,可使天下遂世,考见宋人之真诗学。西崑者,承唐末之余藩而非宋也。师击壤者,开道学之流派而非诗也。轻滑率易者,系晚宋之末流而非宋之真也。”^④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许耀《宋诗三百首序》曰:“世之学者率尊唐抑宋,谓其腐也、纤也,不

① 汪懋麟:《百尺梧桐阁文集》卷二《韩醉白诗序》,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41册,齐鲁书社1997年,第698~699页。

② 陈訐:《宋十五家诗选》卷首,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410册,齐鲁书社1997年,第283页。

③ 王嗣槐:《桂山堂文选》卷二,载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柒辑27册,北京出版社1999年,第186页。

④ 汪诒、姚垌:《宋诗略》卷首,乾隆三十五年(1770)竹雨山房刻本。

知此特宋诗之流弊,非宋诗之真也。”^①宗唐者泛称学宋者有“庸”、“腐”、“纤”三病,以宋诗之病贬抑师宋之流,实是以叶障目,未见宋诗之真,犹如祖宋者讥刺学唐末流摹而不化,皆未能得唐宋诗之三昧。而且,宋人中如承晚唐之余的西崑派、学邵雍“击壤体”的诗人以及晚宋轻滑率易之流,亦非“真”宋诗。

大致说来,摆在清人面前的:一是选诗难,选宋诗尤难;二是前代宋诗选本乏善可陈,可资借鉴者寥寥无几;三是宗宋者捋扯皮毛,滋生弊端,选坛多以唐存宋,而未能以宋诗选宋诗,亟须优秀的诗选范本来正本清源。欲以宋诗救唐诗肤廓、空泛、软熟之弊,而不为学唐者所讥,必先知宋诗者为何。故辨体是诗苑、选坛的首要任务,也是建构宋诗学的不二选择。即对宋诗“验明正身”,宋诗与唐诗有无分别,什么才是“真”宋诗。辨体就是宋诗从唐诗视域中逐渐分离、独立。就诗学理论体系而言,辨体属于诗歌本质论的范畴。辨体实是与唐诗存异,是清人建构宋诗学体系中本体论的根本命题。众多诗人、选家们或为人题序撰跋,或亲自操觚染翰,对宋诗的辨体表达一管之见。在很大程度上而言,清人对宋诗的辨体是与唐诗分不开的。换言之,宋诗辨体是“唐宋诗之争”题中应有之义。在“唐宋诗之争”的大背景下,清人多从性情之真伪、源流之正变两个维度来辨析宋诗异于唐诗之处。

二、以性情、人品论宋诗

承继晚明性灵思潮,明末清初诗论家目睹学唐之弊,多提倡用宋诗来涤清其病,由此带来了宗宋诗风的兴起。清人借助性灵思潮这面大旗,主要是对宋诗与唐诗的辨析,乃至宋诗地位的确立。钱谦益直指学唐末流之非:

今之谭诗者,必曰某杜,某李,某沈、宋,某元、白。其甚者,则曰兼诸人而有之。此非知诗者也。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陶冶性灵,流连景物,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。如人之有眉目焉,或清而扬,或深而秀,分寸之间,而标置各异,岂可以比而同之也哉? 沈不必似宋也,杜不必似李也,元不必似白也。有沈、宋,又有陈、杜也;有李、杜,又有高、岑,有王、孟也;有元、白,又有刘、韩也。各不相似,各不相兼也。今也生乎百世之下,欲以其蝇声蛙噪,追配古人,俨然以李、杜相命,浸假而膏唇拭舌,訾议其短长,蜚蜚撼大树,斯可为一笑已矣。^②

后人取法前贤,本是学诗之途径。若以古绳今,以古律己,竭力“追配古人”,反而会误入歧路,甚至丧失本性。钱氏以为此类人皆非知诗者。诗本性情,发为吟咏,自有不同,犹如人的面目,各有其态。即便唐人亦各有本色,更遑论宋人。恰如柴望康熙三十二年(1693)《宋四名家诗选叙》所云:“初盛以高浑为气格,中唐号为娴雅,降及晚唐,则以雕刻取致,即唐一代之诗,且递变若此,而欲以之范宋人可乎? 宋固有宋之诗也,宋又不一宋也。”^③揆之以理,即不在乎是尊唐抑或宗宋,只要能存留其真性情,便是学诗之正途,可取灵山之真经,得诗道之真谛。诗坛耆旧钱氏为宋诗辨体与独立开风气之先,尤侗曰:

今之说诗者,古风必曰汉、魏,近体必曰盛唐。以愚论之,与其为似汉、魏,宁为真六朝;与其为似盛唐,宁为真中、晚,且宁为真宋、元。……眉山、剑南下笔妙处,有李、杜不能过者,近日虞山亟称之矣。愚又论之,则无论其为汉、魏也,六朝也,初、盛、中、晚也,宋、元也,皆是也,而莫不善于今人拟之一说。有人于此,面目我也,手足我也,一旦憎其貌之不工,……古则古矣,于我何有哉! 今人拟古,何以异是? ……有真性情,然后有真格律;有真格律,然后有真风调。^④

在钱氏倡举宋诗的大纛下,尤侗细加推衍,大声为“真性情”呐喊,呼唤“真我”,反对一味泥古不化。清初“重真”的诗学观念在此一览无遗。此风所被之下,众多诗人跳出尊唐宗宋、非儒即墨的时代偏见。陈之遴曰:“予少时学诗,服膺诸老先生之论,古体必汉、魏,律体必盛唐,罔敢失尺寸。既乃悟其非是。人殊其才,人殊其学,人殊其性情,则亦各为其人诗尔。”^⑤钱谦益以一人有一人之面目,来比喻唐宋诗各有千

① 许襄:《宋诗三百首》卷首,道光二十五年(1845)春水草堂刻本。

② 钱谦益: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三十一《范玺卿诗集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,第910页。

③ 周之麟、柴升:《宋四名家诗选》卷首,载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394册,齐鲁书社1997年,第583页。

④ 王镇远、郭国平编:《清代文论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,第147页。

⑤ 王镇远、郭国平编:《清代文论选》,第183页。

秋，不可轩輊。今人钱钟书申论道：“唐诗、宋诗，亦非仅朝代之别，乃体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两种人，斯分两种诗。”^①又曰：“一集之内，一生之中，少年才气发扬，遂为唐体，晚节思虑深沉，乃染宋调。”^②唐宋诗名曰时代之分，实乃性情之故。唐人有宋诗，宋人亦有唐诗；一人一生之中，亦有唐音、宋调之别。青年主唐，中年入宋，晚年返唐的诗坛领袖王士禛便是其例。上有所行，下必效焉。叶燮为清初宋诗派代表吴之振诗集作序云：“孟举之诗，……五古似梅圣俞，出入于黄山谷，七律似苏子瞻，七绝似元遗山，语必刻削，调必凿空，此其概也。不知者谓为似宋，孟举不辞；知者谓为不独似宋，孟举亦甚愜。盖孟举之能因而善变，岂世之蹈袭肤浮者比哉！”^③可以看出，吴之振诗兼取唐宋，分体各师，不主故常，而有自家面目。吴之振对他人之评“不辞”，“亦甚愜”，这便是其“善变”而出“真诗”、“真我”的注脚。

选坛亦作如是观。康熙十七年(1687)，吴绮作《宋金元诗永序》云：“诗之道本于性情，此之性情非彼之性情也。……十五国之不得不汉魏，汉魏之不得不六朝，六朝之不得不三唐，三唐之不得不宋金元者，气运之所为也。而十五国之后，汉魏成其汉魏，六朝成其六朝，三唐成其三唐，宋金元成其宋金元，则其人之性情在焉。”^④吴氏以为气运关乎时代，汉、魏、唐、宋、金、元诗各有其真性情在。尽管被宗宋诗人汪懋麟所讥：“是选诸体，一律以法，似中、晚者尤多。读其诗而揜其名，止知为唐人之诗，不知其为宋、金、元之诗也。”^⑤是选以唐存宋，但选家由性情来辨别宋金元诗的存在意义不容忽视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许承家《历代诗岑序》曰：“诗以世代分盛衰，然以世代论诗而诗益坏。古人之诗具在，若者汉魏晋及六朝，若者唐，若者宋，有目共睹之也。乃选诗家拘执此见，得人一诗，辄曰若者似汉魏六朝，若者似唐，若者似宋，无论不相肖也。即有矣，而不几于木偶之肖物，神气去而万里乎？盖先设一汉魏六朝唐宋之见于胸中，而非以世代论诗，即以诗别世代。此诗学之所以日坏也。今二子只以诗论诗，而未尝分今古、盛衰之见，其大旨以独抒性灵、推陈出新而止。”^⑥形似神散，犹如木偶肖物。这是典型的以性灵论诗。许氏认为选诗不可囿于时代，切不可预先设定一个标准，方凿圆枘。郭士璟为此选作序曰：“诗本性情，发为歌咏。虽世代为盛衰而出于性情，则盛衰不分。……夫唐岂尽优于宋，宋岂尽拙于唐，即汉魏六朝亦岂尽异于宋？作者须遴选删订，去瑕存瑜，使一出于性情之正始，不以世代分盛衰矣。”^⑦唐宋诗自各有面目，并无优劣之分。这也是从性情、气运来驳斥以时代论诗分盛衰。

列朝列代，诸位诗人皆有自家性情，发言为诗，便是各家之真文字、真性情、真精神。自钱谦益、黄宗羲高举宋末遗民诗人以来，以人品、道德论诗，这也可算作性情论诗的宣言。清人所编宋诗选本，尤其是在清初遗民思潮的影响下，体现出以人品、性情、道德论诗的特点，以人传诗，以诗传人，诗补史阙，诗史互证。选家编选宋诗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弘扬宋人精神，传播天水文化，彰显宋诗的伦理价值，展现文士的人格魅力。此以陈焯《宋诗会》为著，宋遗民诗集《谷音》全部辑录。查慎行族侄查昇为陈訢《宋十五家诗选》作序曰：

就宋言诗，当日号称作手者，不弃数十百辈。而今之竞传者无几，岂非数家之精神发越，长如日星之丽天，江河之行地？其人品、文章、功名、道德，虽久不磨而特于流声发响中，规抚仿佛犹能想见其为人，则宋诗之传之以人，又不仅传以诗也。^⑧

词章之内亦有“盛德大业”，诗人品行文藻，千载之下仍可想见，这正是选诗以立言存史的文化意义之所在。这种选诗宗旨的风气，从清初一直沿续至晚清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邵晫、柯弘祚《宋诗删》刻成，《凡例》云：“诗虽盛于唐，然晚益衰靡，至于气节远不逮宋。如谢叠山、郑思肖忠愤所激，发为□歌，不当以声律求之，叠山谓黍离无兴周之志，所南以铁函贮集沉井，以□□宋之心，此等血诚，皆唐末诗人所绝

①钱钟书：《谈艺录》，三联书店2007年，第3页。

②钱钟书：《谈艺录》，第5页。

③叶燮：《已畦集》卷八《黄叶村庄诗序》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41册，齐鲁书社1997年，第84页。

④吴绮：《宋金元诗永》卷首，康熙十七年(1687)思永堂刻本。

⑤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阁文集》卷二《宋金元诗选序》，第702页。

⑥杨梓、萧殿扬：《历代诗岑》卷首，康熙间积风楼刻本。

⑦杨梓、萧殿扬：《历代诗岑》卷首。

⑧陈訢：《宋十五家诗选》卷首，第280~282页。

无。”^①康熙五十一年(1712)中秋,王史鉴作《宋诗类选序》云:“诗者,吟咏性情者也。……晚宋诸人感伤变革,忠义蟠郁,故多凄怆之作,文信国身任纲常,从容就义,壮烈之语,真可惊风雨而泣鬼神。水云之哀怨,晞发之恸哭,霁山仗义于诸陵,所南发愤于心史,千载而下,犹堪痛心。宋诗之终,终于义烈,岂非道学之流风、忠直之鼓动哉?”^②光绪元年(1875)邹湘侗撰《历朝二十五家诗录凡例》云:“有诗品,有人品,论诗品兼论人品。……尊唐抑宋,此是朝代之见。其真面目、真性情,各有精诣,不可掩也。”^③王文韶序曰:“予观《诗录凡例》暨所选诸家诗,论诗品必兼论人品,人品既正,感动为诗,邪思自绝。因诗以考究其人,因人以讨论其世。即其诗之风调音律,而其时治乱得失,其人学行品诣,毕著于篇章焉。”^④宋人宋诗自有面目,故不可以时代之见尊唐抑宋,此其一。知人论世,以诗究人,知时政之得失,晓学行之品诣,这是诗歌功能论的题中之义,此其二。简言之,“诗以言情,唐宋一也”^⑤,从性情的角度出发,宋人有宋人之诗,唐人有唐人之诗,这只关乎时代,二者并无优劣、高下之分,宋诗自可为其一体。正如清中期厉鹗所云:“诗不可以无体……诗之有体,成于时代,关乎性情,真气之所存,非可以剽拟似、可以陶冶得也。”^⑥袁枚也说:“夫诗,无所谓唐、宋也。唐、宋者,一代之国号耳,与诗无与也。诗者,各人之性情耳,与唐、宋无与也。”^⑦从性情来辨体,诗坛、选坛已达成共识,一代有一代人之诗,宋诗异于唐诗,宋诗作为唐诗附庸的境地逐渐得以改观。当然,这并非诗歌内部艺术型质的辨别。从清代诗学的发展轨迹来看,以性情、人品、道德等辨宋诗之体,与清人重“真”的观念息息相关。

二、以源流、正变论宋诗

与清人求“变”观念密切相关的是,诗人、选家还多以源流、正变来辨宋诗之体。从诗史的源流考察,宋承唐后,宋源于唐,是无可争议的常识。但这又可分为几种论调:有的认为宋不如唐,有的则不置可否,有的认为宋出于唐而变于唐,只是两种范式,并无优劣之分。

“唐诗沿六朝,宋诗出唐贤。”^⑧在清人的诗史观念中,宋源于唐乃一大共识。宋不如唐,多是宗唐派操觚家的惯用陈词。徐曰都《唐宋诗本序》曰:“大庾戴侍御篋圃评选唐宋诗,……予谓诗与时变更者也。今士甫能拈韵辄示于人,曰吾宗唐而祧宋。夫果其能唐也,匪不足以进取,乃考其所樵,声格往往去南渡诸家远甚,何论北宋?故宋诗之不逮唐,时代使然也。”^⑨潘问奇《宋诗啜醢集序》曰:“夫宋之逊于唐,尽人能知之,亦尽人能言之矣。然余窃谓岂惟唐使溯而上之,即中晚已不及初盛。初盛不及汉魏。汉魏又不及《三百篇》。此盖气运升沉之数。虽造物有不能为挽回者,何独于宋过责哉?”^⑩从时代升降兴替而论,古繁衍今,今不如古,在这种倒退、复古的诗史观念下推衍开去,自然会导致宋源于唐而逊于唐的论调,会闹出《三百篇》尚不如鸟迹代绳的笑话。在重真、求变、尚奇的思潮中,这种蹈袭故常、落后退化的观念终不能流布于时。毕竟诗史是向前发展的,请看叶燮那段关于中国诗史的精辟之论。^⑪前启后承,因时递变,故宋诗自有“安身立命”之处。随后那段以生物周期的譬喻,不仅至今让人津津乐道,更重要的是使人懂得了诗至宋而“能开花”,“事方毕”。也如后人所说,较之唐诗,宋诗堂庑大开、体制日精。这极大地影响到诗人、选家们的诗史观。诸多宋诗选本的序跋都可体现出这一点。潘江《宋元诗会序》曰:“诗固不始于唐也。不始于唐,而规规焉,谓唐以后无诗,遂欲抹撇宋元,蔽以迂弱纤薄之一言,乌得为通论欤?”^⑫龚丽正《宋诗选粹序》云:“执一代之气体而以为不可以易焉者,非通人之论也。今天下言

①邵 晫、柯弘祚:《宋诗删》卷首,康熙三十三年(1694)刻本。

②王史鉴:《宋诗类选》卷首,道光十九年(1839)乐古斋修补康熙本。

③邹湘侗:《历朝二十五家诗录》卷首,光绪元年(1875)新化邹氏得颐堂刊本。

④邹湘侗:《历朝二十五家诗录》卷首。

⑤许耀:《宋诗三百首》卷首。

⑥厉鹗撰,董兆熊注,陈九思标校:《樊榭山房集》卷三《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,第735页。

⑦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七《答施兰垞论诗书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,第286页。

⑧王镇远、鄂国平编:《清代文论选》,第699页。

⑨戴第元:《唐宋诗本》卷首,乾隆三十八年(1773)览珠堂刻本。

⑩潘问奇、祖应世:《宋诗啜醢集》卷首,清刻本。

⑪叶燮著,霍松林校注:《原诗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,第33~34页。

⑫陈焯:《宋元诗会》卷首,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刊本。

诗者，竞诟赵宋，其意欲惩夫闾冗、芜蔓、俚诞之负重名者，而束之于唐人之格律，不可谓非正论。顾宋之始为诗者，何尝若是乎？苏则学韩矣，欧、梅、黄皆为学杜矣，陆则学白矣。学之，而不屑以字句面目之，肖为肖，欲自成面目于两间，而造物者遂适异以一代之面目，以成为一代之气体，微独宋然？昔者汉魏之变而为六朝，六朝之变而为初唐，初唐之变而为杜、韩，皆造物之所必开，而六朝与唐人无权焉。唐以后之诗亦若是而已矣，微独诗然？”^①概言之，从源流论的角度来看，宋源于唐是时代发展也是诗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从重真求变的思潮而言，以唐绳宋来贬斥宋不如唐，直谓唐后无诗，这种退化、短视的诗史观必然遭到历史无情的淘汰。宋诗，理应获得恰当的诗史地位。

不仅如此，清人对宋诗源流的辨识已推衍到具体作家身上。《宋诗选粹例言》云：“宋人学唐，如王黄州之学香山，庐陵之学昌黎，林处士之学孟襄阳，徐仲车之学卢仝，谢皋羽之学李长吉，几于各体具备，学韦苏州者殊少，惟朱紫阳近之。”^②曹庭栋《宋百家诗存序》曰：“独有宋一代之诗，诸选本所采寥寥，并不获媲美元、明，岂见闻俭陋亦侈口三唐者，附颊逐响，莫为两宋一揭尘翳也？且宋人何尝不学唐，骑省学元和，庐陵学昌黎，宛邱学香山，和靖学韦、孟、陈、黄为西江宗祖，亦学少陵，四灵为江湖领袖，亦学姚贾。特风会渐移，同一门户、途径，自别外此，标新立异，不知凡几。”^③自宋初徐铉、王禹偁以迄宋末四灵、谢翱，莫不学诗于唐而自成一家面目。不单单是对宋代诗人师法的渊源流变有了深刻的体认，对两宋诗史的演变也有了明确的看法。康熙晚期，王史鉴作《宋诗类选序》。^④此序在清代宋诗选家中难得一见，不啻为一部宋诗流变小史。从宋初三体到晚宋遗民，宋诗大家、名家庶几囊括其中。通过对众位诗人的师法对象、艺术特质及人格魅力的评鹭，天水一朝诗史的各个分期与数次演变，轮廓大体勾勒清楚。乾隆年间，全祖望作《宋诗纪事序》，以为宋诗史经历了五次嬗变。^⑤降至道光，侯廷铨编《宋诗选粹》，弟子作《例言》以为：“宋诗凡三变，建隆、太平兴国间，沿五季之余，益以杨、刘、钱西崑之体，衰靡已极，迨王黄州、欧阳公出以宏肆而诗一变；江西派兴，多入颓唐，四灵矫之，宗晚唐而一变；然边幅拘窘，意致迫狭，刘后村、戴式之振起，上接范、陆，而又一变。”^⑥无论是五变，抑或是三变，都充分说明清人对宋诗流变的关注与认识。这对于宋诗的辨体与传播皆是有益的。

自顺康以降，诗苑、选坛在重真求变的思潮下，从源流、正变的角度，逐渐认识到宋源于唐而异于唐的特质。以宋诗选宋诗来突显“真宋诗”的呼声愈来愈响亮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仲秋吴之振作《宋诗钞序》云：“宋人之诗，变化于唐，而出其所自得，皮毛落尽，精神独存。……今之黜宋者，皆未见宋诗者也。虽见之而不能辨其原流，则见与不见等。”^⑦吴氏认为宋人生唐后，诗变化于唐而能得其精粹，化腐朽为神奇。而今之黜宋者皆未能辨其源流，识其真谛。操觚家以唐选宋，实是泯灭了宋诗之真。正如吴氏所讥：“万历间，李蓑选宋诗，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。曹学佺亦云：‘选始莱公，以其近唐调也。’以此义选宋诗，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，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。”^⑧以唐存宋，以宋附唐，自非正途，必使宋诗隐而不彰，走向销亡。换言之，从康熙前期宋诗风兴起，宋源于唐而变于唐，以宋选宋，这种选家意识便已出现，而且凭藉《宋诗钞》的广泛流传而影响渐大。王嗣槐《积书岩宋诗删代序》曰：

古今诗，各因风气而变。……至宋诗神韵风格，与前代迥殊，非其时名流、大家，与前人才思不相及，亦风气使然耳。操选政者多，以别调自之。……夫宋之不类乎唐，虽择其似者与为类，亦似其形则有之，似其神则迥然不同也。盖诗之为诗，一代有一代之风气。斯一代有一代之好尚，一代有一代之名。……余受而读之，而叹其不徒以唐诗选宋诗，而以宋诗选宋诗，与前后人所选自有殊耳。^⑨

①侯廷铨：《宋诗选粹》卷首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刻本。

②侯廷铨：《宋诗选粹》卷首。

③曹庭栋：《宋百家诗存》卷首，乾隆六年（1741）二六书堂刻本。

④王史鉴：《宋诗类选》卷首。

⑤全祖望：《鮑塘亭集外编》卷二十六，载朱铸禹校注：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，第1247页。

⑥侯廷铨：《宋诗选粹》卷首。

⑦吴之振等：《宋诗钞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，第3页。

⑧吴之振等：《宋诗钞》，第3~4页。

⑨王嗣槐：《桂山堂文选》卷二，第185~186页。

王氏深受尊唐显贵冯溥的礼遇,曾写信给诗坛主要人物王士禛、王又旦等人,向宋诗倡导者发难,提倡回归唐音。康熙中叶,是唐宋诗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。虽是代他人言说,实已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就是这样一位宗唐护唐的人,也以为诗因风气、时代而变,宋诗之神韵、体格已迥异于唐。从性情而言,唐人亦有宋诗,宋人亦有唐诗,但是以“唐诗选宋诗”,则宋人宋诗之精神不见,所选之诗也“庶几与唐为类”,这不是真正的宋诗。唯有操政者出以别调,“以宋诗选宋诗”,才能让世人见到源于唐而变于唐的“真”宋诗。也唯有如此,学诗者可滤唐之肤廓、软熟,去宋之俚俗、腐涩,领悟到唐自为唐,宋自为宋的诗中三昧。乾隆中叶以后,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崛起,融通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;以翁方纲为首的宗宋诗派声名大噪,宗宋诗派的力量日益壮大,并有凌越之势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有些选家一方面从性情论出发,以为唐宋各异;另一方面从源流论出发,则认为宋源于唐而自有一家面目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姚垞作《宋诗略序》曰:

诗人,变化于矩矱之中,舒写性情,牢笼物态,脱去唐人面目……岂知宋诗皆滥觞于唐人哉?……以两宋较诸三唐,宫商可以叶其音也,声病可以按其律也,正变可以稽其体也。……故推陈其源流如此。非敢援唐以入于宋,亦非推宋以附于唐,要使尊宋诗者无过其实,毁宋诗者无损其真而已。如必谓唐、宋源流各异,……奈何独以唐人而废宋诗也。^①

此序兼合性情与源流,以辨宋诗之体,为宋诗正名,其中深意颇可玩味。除了开头以性情论宋诗“脱去唐人面目”之外,更多地从唐宋二者之源流着眼,通过对宋代一系列诗人与唐人关系的辨析,推陈“宋诗皆滥觞于唐人”。唐源宋流,唐宋异质。随着唐宋诗之争的深入,唐宋诗各自之弊病,诗林也渐有体认。若以明嘉、隆讥宋无诗,以宋诗之短掩饰其长,实是以唐废宋,使“真”宋诗湮灭不彰。因而,“援唐以入于宋”,“推宋以附于唐”,一失之于真,二拘之于偏。若以此来学宋诗,犹如明“七子”摹拟盛唐,形肖神离,也会是优孟衣冠的下场。理性的态度是“尊宋诗者无过其实,毁宋诗者无损其真”。“正变可以稽体”,唯有如此辨源析流,“真”宋诗才呼之愈出。

另外,在乾嘉重考证、尚学风气的风气下,诗坛对宋人学问化、文人化多有钦赏,故有以此肯定宋诗、辨别宋诗者。这一点可追溯到清初的王士禛:“予习见近人言诗,辄好立门户,某者为唐,某者为宋,李、杜、苏、黄,强分畛域,如蚩、触氏之斗于蜗角,而不自知其陋也。……欧、梅、苏、黄诸家,其才力、学识皆足凌跨百代,使俛首而为撝拾吞剥秃屑俗下之调,彼遽不能邪?其亦有所不为邪。”^②王氏认为唐宋诗不可强分畛域,充分肯定宋人尤其是欧、梅、苏、黄等宋诗大家的才力与学识。迄至清代中叶,这种认识更是深入人心,也影响到了选坛的编纂取向。如厉鹗等人所编的《宋诗纪事》,征引书籍达一千多种,辑录诗家三千余人,不可不谓之鸿编巨帙。厉氏自序曰:“宋承五季衰敝后,大兴文教,雅道克振。其诗与唐在合离间,而诗人之盛,视唐且过之。”^③所谓“合离间”,大致即指宋诗源于唐而异于唐之义。稍后,“肌理派”盟主翁方纲曰:“谈理至宋人而精,说部至宋人而富,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,盖刻抉入里,实非唐人所能囿也。”^④厉鹗就是清人阅览宋代说部最多的一位选家。翁氏又云:

若夫宋诗,则迟更二三百年,天地之精英,风月之态度,山川之气象,物类之神致,俱已为唐贤占尽,即有能者,不过次第翻新,无中生有,而其精诣,则固别有在者。宋人之学,全在研理日精,观书日富,因而论事日密。^⑤

宋诗异于唐诗的一大特质便是富有学卷气,而且这种“刻抉入里”是源于唐而能“次第翻新,无中生有”。宋调是可与唐音异质并举的。这皆因宋人学问化之故。诗坛提倡学问,推崇学人之诗,并且与性情、源流结合起来。法式善曰:“诗之为道也,从性灵出者,不深之以学问,则其失也纤俗;从学问出者,不本之以性情,则其失也庞杂。兼其得而无失,甚矣其难也。……一人有一人之诗,一时有一时之诗,彼与此不

①汪照、姚垞:《宋诗略》卷首。

②《王士禛全集》卷二《黄湄诗选序》,齐鲁书社2007年,第1546页。

③厉鹗等:《宋诗纪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,卷首。

④翁方纲:《石洲诗话》卷四,载《清诗话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,第1426页。

⑤《石洲诗话》卷四,载《清诗话续编》,第1428页。

相蒙也，前与后不相混也，安得执一以例百哉！昔东坡学靖节，而其诗不似靖节；山谷学少陵，而其诗不似少陵。惟其不似也，而东坡、山谷之真始出。”^①法氏以为性情须济之以学问，提倡诗人取法前贤而有一己之真诗。这不仅给诗坛、选坛带来了新的气息，也是宋诗辨体最终融合的大趋势。

三、小 结

清人对宋诗的辨体是在尊唐的正统诗学观念下的反拨与矫正。通过清代近三百年宋诗学的发展与演进，从性情论来说，清人认为唐人中有宋诗，宋人中亦有唐诗，一人之中亦有唐宋诗，各家自有各家之面目，不可以一驳百。就在宋诗日益备受追捧之际，无论尊唐派还是宗宋派的有识之士，都看到了仿习宋诗的弊病。邵长蘅对此批评道：“曩时，海内一二称诗家喜标别同异，更相齟齬，某人某体是同乎吾也，则尊之誉之；某人某体是异乎吾也，则诋之讪之，虽心识其工，不欲与也。”^②专尊一家一体，方法极不可取，弊端颇为可怕。刘世南在考察清初宗宋派时，认为如钱澄之、宋琬、宋荦等宗宋派从创作实践中已总结出了一条原则：择善而从，分体各师。^③ 其实田雯早就提出了这条：

宋人之诗与夫唐人之诗，渠有异道乎？惟其生于宋也。……谈风雅者，一概牴牾訾议之，谓宋诗为非，譬啜狂泉而病呻吟也。嗟夫！亦尝撝括宋代梅、欧、王、苏、黄、陆各大家之诗，按其篇章而一窥其大略否乎？束书不观之徒，寓目“云淡风轻”一首，辄诋宋人之诗比比是矣。余尝谓：学诗者宜分体取法乎前人……学诗者何分唐、宋？总之，以匠心求工为风雅之归而已。^④ 田雯明确地指出：唐宋无别，各有所短长，不可因噎废食，举唐诎宋。学诗者当随其性情天分，不仅兼宗唐、宋，还可远追汉、魏，近绍元、明，分体各师，归于风雅，自成一家。此乃清人折衷融通诗学之滥觞。这种分体各师、折衷融通的诗学主张，不仅消弭了时代之分，还解构了唐宋之争，融会了众家之说，昭示了诗学发展之大势，开辟了创作实践的一条坦途。

●作者简介：谢海林，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，文学博士；海南 海口 571158。

●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①法式善：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二《鲍鸿起野云集序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，第690页。

②邵长蘅：《邵子湘全集·青门簪稿》卷七《金生诗序》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47册，齐鲁书社1997年，第742页。

③刘世南：《清诗流派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，第223页。

④田雯：《古欢堂集》卷二十五《鹿沙诗集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，第1324册，第255～256页。